

杜威小傳：

杜威 (John Dewey)，於一八五九年生於美國巴蒙特州巴林頓。父親開小食品店，杜威排行第三。約翰霍布金大學研究所畢業後，便受任密西根大學哲學講師。起初受黑格爾的影響，後與詹姆士 (William James 1842—1910)，米德 (George Herbert Mead 1863—1931) 接觸，成為實用主義者 (Pragmatist 或譯實效主義者)。一八九四年任芝加哥大學哲學、教育學、心理學院院長，並創設了實驗學校，後轉任哥倫比亞大學，至一九三〇年退休。除本書以外，其餘著作有「經驗與自然」(Experience and Nature, 1925)「確實性的探究」(Quest for Certainty, 1929)「人性與行動」(Human Nature and Conduct, 1922)等。其後，一方面著「邏輯學」(Logic, 1939)討論科學方法，另一方面著「文化與自由」「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」等，論述面臨危機的民主主義諸問題。他於一九二九年曾主張組織第三黨以應對經濟的變化，並參加教員協會、美國公民自由協會、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，獨立政治活動聯盟等促其組織化。他主張應予逃亡到墨西哥的托洛斯基公開辯論的機會，並替由於對性道德的態度而受指責的羅素辯護。他曾到世界各地旅行，對蘇聯及中國的革命印象頗深，對戰前的日本則抱着批判的態度。他於一八八六年結婚，但早年喪妻，及八十七歲才再婚。一九五二年，以九十二歲長壽去世。



杜威 「民主主義與教育」

永井道雄作
莊園譯

約翰·杜威的著作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不朽名著「人性與行動」，及哲學史上頗受注目的「經驗與自然」，「確實性的探究」等。但做為一個思想家活動的較初期，他寫了一本「民主主義與教育」(*Democracy and Education*)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。

杜威是邏輯學家，也是社會心理學家。但從根柢推動這位思想家半世紀以上的活動，是他對於民主主義與教育的深切的關心。

十九世紀末，他在芝加哥大學創辦實驗學校。二十世紀初，因為幾個學生的協力，使得他的教育思想風靡全美。他的另一位弟子胡適，亦將其思想介紹到辛亥革命後的中國。革命後的蘇聯教育亦同樣受到杜威的影響。所以，他雖然是邏輯學家、哲學家，但並不為學問而學問。以他自己的說法，哲學於教育中無所不在，又說，「教育實在是哲學學說的具體實行，是檢討它的實驗室」。

從蘇格拉底的「自辯」(*apologia-apology*)到史賓塞(Herbert Spencer 1820—1903)的「教育論」，能在思想史上留下名的人，大部份對教育都有深刻的理言與看法。但卻沒有一個人像杜威那樣信

賴教育，甚至展開可稱為教育萬能論這樣的思想。從這一種意義說，杜威在思想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。他的出現，無疑是二十世紀，尤其是這個時代的美國所促。二十世紀的教育規模，於世界各地都有飛躍的擴張，而美國更是各國的先驅。到現在為止，美國文明給世界的影響，教育可說是最重要之一。革命後的蘇俄更以美國的教育為其模範，或是競爭的對手。日本在明治初年，透過馬萊所學的也是美國式教育。第二次大戰後，美國在佔領日本時期，也曾致力教育改革，令人記憶猶新：它不是依賴政治、經濟、或軍事，而是通過教育去自覺地統御人與社會。杜威這種思想，正是二十世紀初期，對美國所抱有的夢的突破。

杜威對於教育所抱的期望，與他同時代的人並無不同，而他的思想為什麼能喚起人們新鮮的自覺，在教育界掀起旋風呢？乃是因為他應用了所謂教育的一般性原理的哲學，使教育的認識有了根本的改變。當時許多關心教育的人士，所依憑的是傳統的人本主義，也是理性人的理想。杜威則嚴厲地批評這種傳統的立場。杜威尊重人，但不是尊重只在社會名士中才見到的，與生活隔離的柔軟的人。對他來說，人是自然

的存在，活生生的生活主體。他也重視知性，然而他所指的知性，並不是離開經驗而獨立的觀念。知性是人面對具體問題時所產生的，它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與力量。杜威這種批判，其根本的憑藉是什麼呢？那是一種包含着人性與知性的經驗，杜威自稱這種立場的哲學為直接經驗論。

所以，杜威雖秉承了英國經驗論的源流，但英國經驗論認為經驗是主觀的，與理性相對，杜威却將理性包含在經驗之中，視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的運動本身為經驗。杜威雖然承受皮爾斯(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—1914)、詹姆士的淵源，屬於實用主義者之一，但皮爾斯着重於追求觀念的明證的認識論，詹姆士則側重對人的理解的心理學，而杜威的重點，是在把握知性與人性經驗構造。身為一種生物，身為社會的人，雖然受社會環境的制約，却能利用知性，來控制環境以及自己本身。杜威所關心的是如何統御、如何改變人、社會以及自然。

他的經驗論，是想在高度機械化、構造化的二十世紀美國，使人復活，追求人與社會的再構成的危機哲學。杜威批評最激烈的，是植根於十八世紀初的個

人主義及傳統的自由主義。但二十世紀是組織的時代，人如想不為組織所淹沒，想要保有自己的力量，就必須究明環境與人之間交互作用的構造，並於其中尋找變革的線索。自由不僅是意識的問題，也是存在的問題。畢竟，人與社會的改造，必定是一事的兩面。所以杜威認為，究明經驗的構造，是保護面臨危機的民主主義的關鍵。

「教育，是使經驗的意義更加深刻，並再造經驗以增加指導以後經驗，或重新組織經驗的力量。」

杜威將經驗論做為其哲學的根基，並以教育來重新編制社會。這裏的教育，當然不是「學校教育」這一句話所限定的狹窄的意義。本書的一章至五章，是談論教育的本質，他所稱教育，是指人自出生到老死的生活本身。在進入學校之前的幼年時期世界，出學校之後的大人世界，以及政治或經濟的世界，都有教育。人的生活，或者說，人的經驗能視為教育，是因為人並不像其他動物具備完善的本能，以適應環境。杜威却是利用人的弱點，來導出教育的可能性。由於本能上的弱點，人必須從習慣中學習適應。因此只要詳細觀察學習過程，其中總包含着最小限度的自主性

。習慣是可以一點一滴加以組織的，難道我們不能自覺地把握這種過程，用知性之力來強化經驗的再構成嗎？從幼年時期的世界，到大人們激烈競爭的政治界，如能用知性加強控制，經驗就可以更豐富，且具有更深的意義吧。這是杜威的教育主張。

這樣，教育經過強化以後，就能達及民主社會。在一個社會之中，每個個人依其多樣的關心去從事各種活動，另一方面，一個社會經常容納另外的社會，用以反覆不斷地再形成社會的新習慣。這正是經由強化教育所導致永久革命的民主社會。杜威如此確信，所以本書出版以後，到他去世的三十六年間，他一直過着實踐與思索的生活。但他那理想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果真實現了嗎？

不管戰前或戰後，杜威給予日本的影響相當大。自明治末年以來，哲學家田中王堂、經濟評論家石橋湛山，以及大正時期的新教育推行者，戰後學習美國哲學的思想家，以及關心教育的人們，都受到杜威思想的強烈刺激。這段歷史，有戰爭、有經濟恐慌，人類發現人有超越知性限界的深淵，一股人類所不及的力量在無情地推動社會。然而這便證明了杜威理論的

錯誤？認為杜威也不過是時代所產生的理想主義者而已？這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問題，但不管對他批評如何，杜威下面這句話值得吾人深思：

「一盎斯的經驗，勝過一噸的理論。因為，任何學理，只有經驗才能發揮它的真正意義。」

譯者按：本書中譯本——民主主義與教育（商務印書館印行）

缺書已久，再版問世

文學探索

林柏燕著

每冊三十五元。全省各大書店均售。
直接函購九折，本刊定戶八折優待。